打破舊路徑依賴 港發展須新路向

議事論事
陳克勤

4月15日，特區政府舉辦2024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以視頻連線方式出席並發表主旨致辭。夏寶龍主任指出，今天的香港，有國安法律護航，終於迎來了全力拚經濟、謀發展的最好時期。並對香港實現由治及興提出「五個需要」，當中明言「要主動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跟上時代發展步伐，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在變局中打開香港發展的新天地。」

夏寶龍主任提出要「識變、應變、求變」，近日在香港輿論場引起廣泛共鳴與探討。面對外部環境愈加複雜，科技升級加速迭代的世界大環境，如何探索出一條適合香港的新發展路徑，無疑是實現由治及興的關鍵所在。

夏寶龍主任在致辭中強調，「『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一個企業的成長，一個產業的壯大，一個地區的發展，必須順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順時而為、順勢而為，才能有安身立命之本，才能做發展的常青樹。」這正正說明了香港如今面臨的挑戰：香港經過多年的積累和發展，在金融、貿易、法律、專業服務等領域取得充分的國際認可。但如何利用好上述優勢，為香港下一階段的發展開拓出新路徑、新方向，是香港需要攻克的重大課題。

跳出「舒適圈」創造新優勢

正如夏寶龍主任所言，「傳統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發展中創造的，同樣也要在發展中去鞏固、去提升。」

古語有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回望國家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快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傲人成就，創造了經濟增長速度冠絕世界的奇跡。但國家並未一味依賴既有的發展路徑，而是因勢而變，提出了透過挖掘新質生產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經濟結構轉型重大戰略。

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香港，亦需要應對世界格局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及生產模式可能發生的重大轉變。面對美西方對中國敵意越發強烈，人工智能催生的生產力以指數級速度與日俱增，沒人敢說現時的香港優勢可以一直保持。香港需要敢於跳出「舒適圈」，不依賴現時的發展模式，創造出新的香港優勢。

夏寶龍主任的致辭，亦為香港發展開出「貼士」，他指出，「香港由治及興本質上就是一條創新變化之路。大家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需要團結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維、新辦法、新路徑解決面臨的問題，敢於說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於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情，不斷突破自我、大膽創新，努力實現香港發展的迭代更新、轉型升級。」

夏寶龍主任所給出的解決方法躍然紙上，便是希望香港可以利用好自身優勢，挖掘出更多新質生產力，以完成香港的經濟產業結構升級與轉型。香港過去的成功，無疑令香港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對於新事物、新理念、新方向，會習慣性地用固有思維去看待。

對此，有一個例子值得香港社會思考：10多年前，當國家大力推動發展新能源汽車，世界範圍鮮有人預見，中國新能源汽車能夠發展至今時今日的規模和水平，更多是對政策與措施的質疑乃至冷嘲熱諷。如今國產新能源汽車遠銷全球，成為了國家科技發展、經濟增長的一張亮麗新名片。

回到香港，我們有充足的科研人才儲備，社會具備較為成熟的環保意識，更有發達的資本融資市場，完全有條件圍繞環保產業，推動研發環保新科技。**隨着電動車越來越普及，電池回收成為全球面對的一大課題。特區政府可針對性地與科研機構及相關企業展開對接和合作，推動電動車電池回收技術的研發，並在香港應用示範，從而催生出一系列以環保、可持續為核心競爭力的新產業。**

惟現時無論是社會輿論，又或是部分人士，往往集中以可用性、可行性的角度思考問題。例如近期熱議的垃圾收費問題，社會大多聚焦於能否成功推行的討論，但垃圾收費不止是狹義上的環保議題，更可以推展至新環保產業及相關科技的發展。若事事都只考慮現成方案，並不利於香港自身發展新科技與新產業。

保持「人無我有 人有我優」

筆者希望，特區政府在「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之下，在制定政策時可兼顧香港更長遠、可持續的發展，為香港未來可能誕生的新產業、新領域提供更多的成長可能性。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先生創新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並首先用於解決香港問題，也讓回歸後的香港擁有了「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成為今後香港發展的安身立命之本。今天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需要再一次解放思想，打破固有的路徑依賴，圍繞香港的特點因地制宜，思考新的發展路向。只有如此，香港才能保持「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獨特優勢，從而實現由治及興。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

落實「雙法雙機制」築牢維護國安屏障

議會內外
嚴 剛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日前出席香港特區2024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禮並致辭。鄭雁雄主任指出，香港特區要切實發揮好「雙法雙機制」的法律實效和威懾作用；堅定統籌高水平安全和高質量發展；加快推動由治及興，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香港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2014年4月1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習近平主席對包括港澳特區在內的全國全面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了明確要求：「要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會治理體系，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形成維護國安的銅牆鐵壁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核心要旨對香港而言，就是自始至終地以國家總體安全與發展利益為出發點，堅持以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重，堅持以750萬市民的切身利益為宗旨、以特區經濟安全為基礎、以科技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特區局部安全和國家整體安全，維護全局性整體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在切實有效地保障市民大眾的福祉福利的同時，為香港特區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築牢堅實可靠的安全屏障。

鄭雁雄主任對香港特區落實「雙法雙機制」，構築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的雙保險提出了五方面的明確要求：一要堅定維護「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二要堅定統籌高水平安全和高質量發展；三要堅定正本清源、強化國家意識和家國情懷；四要堅定信心決心，在緊抓機遇中開創香港發展的光明未來；五要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管治團隊擔當起憲制責任。

鄭雁雄主任提出「五個堅定」，對於香港特區構築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的「雙法雙機制」雙保險，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與作用。

中央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發揮着憲制性的主導作用，香港特區管治者對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更負有直接全面的、義不容辭的主體責任。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駐港國安公署與特區國安委構成了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缺一不可的「雙法雙機制」。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施，是推動香港從大亂到大治的轉折點，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誕生，則是大法引領大治的標誌點，標誌着法治香港步入法制體系完善、效能可靠的發展階段，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雙法雙機制」雙保險，已經堵塞了法律漏洞，並形成了維護國家安全的銅牆鐵壁。

「雙法雙機制」必將有效發揮中央事權和特區責任雙保險作用，成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標本兼治之策。這也從法律法治層面，高度展現了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與香港特區管治的行政主導權。

「雙法雙機制」從憲制層面充分展現了香港特區「兩制」的固有特質，在充分發揮「兩制」優勢與活力的同時，必須堅定「一國」主導，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才能令到「雙法雙機制」更加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也才能在法治的基礎上構築維護特區國家安全的雙保險。

香港已經邁向由治及興的新時代，並且開闢了依法治港的新時代，落實好「雙法雙機制」，就是回歸「一國兩制」的初心，就是強化「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就是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正如鄭雁雄主任所言，「雙法雙機制」因「一國兩制」而來，為「一國兩制」而往，是「一國兩制」的最佳制度安排，落實好「雙法雙機制」，才能鞏固好「一國兩制」的不變、發展好越來越好的改變。

「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發展和安全猶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發展離不開安全，安全更要靠發展來保障，只有確保國家安全，才能有可持續高質量發展。

沒有安全和穩定，社會持續發展繁榮就無從談起，增進民生福祉更加無從談起。**把握好完善好利用好「雙法雙機制」，香港才能更好拚經濟、謀發展、惠民生。要全力發揮好「雙法雙機制」保障高水平安全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作用，在全方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支持國家高質量發展中取得香港特區更好更快更高發展**。

保障香港持續高質量發展

保國家安全就是保「一國兩制」，就是保香港繁榮發展。有中央全力以赴的支持，特區各界更要積極主動配合國家發展戰略，站在國家安全國家發展大局的高度，牢牢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切實履行國家憲法確立的每一位公民都有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憲制義務，全面準確落實「雙法雙機制」，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治體系，完善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平衡與銜接。**加快推進特區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保障特區可持續高質量新發展格局，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以高質量發展促進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要在法治建設中維護國家發展利益，在可持續高質量發展中助力強國建設**。

立法會議員

美英的「言論自由」真相

靜思明路
湯家驊

英國蘇格蘭最近通過一條《仇恨罪與公共安全（蘇格蘭）條例》，把煽動任何有關年齡、殘疾、宗教、性別或性取向之仇恨列為刑事罪行，再一次引起社會廣泛討論言論自由是否尚存。**留意此條例並非唯一「以言入罪」之條例，英國本身早於1986年便已設立「仇恨罪」，分別只在於蘇格蘭把構成「仇恨罪」之範圍大幅擴展至差不多所有群體。很多人也在問，究竟今天言論自由之根本概念是否早已改變？**

據說言論自由的概念早於公元前已存在，但無論在中國或西方國家，反君主、反國家之言論也一直被視為死罪。近代受法律保障之言論自由始於英國於16世紀時通過一條規定議員在議會中發言擁有絕對自由權利，而不受任何法律規管之法案。留意此權利只局限於議員在議會履行公職時的發言。不過事實是與此同時，英國亦早已設立「煽動罪」。那個年代的「煽動罪」相當嚴苛，即便是基於事實亦非答辯理由，原因是煽動言論越是真實便越具破壞性。

當時英國殖民地遍布全世界，所有其屬土及殖民地均跟隨英國法律把「煽動罪」納入當地法律系統內。香港的「煽動罪」亦源於此。**時至今天，無論有關地區是否仍屬英聯邦國家或殖民地，「煽動罪」仍以各種不同形式繼續成為有關地區法律的一部分。這便是所謂「以言入罪」的法律起源。**

除了「煽動罪」，法律一直視誹謗和藐視法庭之言論為違反法律之行為。誹謗更分民事誹謗和刑事誹謗兩種；民事誹謗涉及傷害個人名譽，刑事誹謗則是指誹謗制度之行為。藐視法庭亦分民事藐視法庭和刑事藐視法庭兩種。前者針對不遵從法庭指令之行為，後者則是針對一種貶低或引起對法律或司法系統產生憎恨或蔑視之行為。這些違法行為均建基於任何人不得以行使言論自由之名而傷害他人的權利或司法或國家根本制度。這概念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亦被納入於《國際人權公約》之內，明確地規定言論自由並非絕對。

回看特區，我們並沒有「仇恨罪」。即便是剛剛通過實施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中，有關「煽惑罪」的條文亦只是沿用港英時代通過的《刑事罪行條例》中之有關條文。**換言之，特區的「煽惑罪」範圍從未因《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通過實施而有所擴闊。這與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陸續把製造仇恨之言行視為刑事罪行相比，可說是相當保守。**

在資訊流通發達，無孔不入的今天，言論可構成之破壞性早已遠遠超越16世紀時的社會狀況。最重要的是，社交媒體之普遍性和廣泛性給予有心人一種輕易滲透及散播謠言之有效渠道；加上今天不少媒體均具有政治背景，缺乏中肯或中立之立場，已令今天的社會逐漸轉變，往日毫無制約的言論自由是否仍符合今天之社會狀況，實是值得商榷。

以色列議會最近通過一項法案，允許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為名，關閉在以色列營運的半島電視台；美國國會眾議院早前以所謂「國家安全」為藉口，以在美國禁止使用作脅迫，試圖將社交媒體TikTok強制剝離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等，這些是今天美西方言論自由空間已日漸收窄之最佳例子。**從美西方政府及媒體對這些明顯侵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之行為默不作聲，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美西方只要政治立場正確，再沒有什麼所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可言了**。這可能便是21世紀美西方言論自由雙重標準的真實寫照。

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資深大律師

拜登政府陷入理論和思想混亂

知微篇
周八駿

拜登政府在烏克蘭和中東皆已陷入戰略困境，反映美國的戰略能力不足以支撐其霸權霸凌行為。如果那只是美國的實力已無法與其慾望相匹配，那麼，拜登政府兩位重要成員最近所暴露的理論和思想混亂，則證明，美國在全球的霸權衰敗已難以逆轉。

眾所周知，拜登政府財政部長耶倫是著名經濟學家。她最近炮製了一個觀點——中國在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和鋰電池等新產業的產能過剩。

言論屢犯低級錯誤

2024年3月27日，耶倫訪問美國佐治亞州一間太陽能電池製造工廠。該工廠曾於2017年關閉，美國財政部稱，很大程度是由於廉價進口產品湧入市場。耶倫不顧該工廠是在拜登政府的《通貨膨脹削減法案》支援下重開這一無可掩蓋的事實，指責中國的相關產能過剩，使產品低價出口國外，維持了中國的生產和就業，卻迫使世界其他地區工業萎縮。

4月4日至9日，她訪問中國期間，向中國政府領導層和公眾反覆宣傳她的「中國產能過剩論」。耶倫飽讀西方經濟學名著，熟悉西方經濟學基本原理，但有關言論卻犯了3個低級錯誤。

第一，她混淆了經濟周期性失衡與經濟結構性失調。

由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無形之手經常出錯，經濟周期性失衡或遲或早會發生。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亦即供應大於需求的經濟衰退，未必反映供給側出現了產能過剩。經濟衰退和政府宏觀經濟政策雙重調節，會達至市場供需新平衡態。惟在經濟結構性調整和重組期，若干產業或行業會被淘汰或改造升級。這些被淘汰或改造升級的產業或行業，在它們被淘汰或改造升級前，會表現為持續的產能過剩。

第二，耶倫混淆了夕陽產業（行業）與朝陽產業（行業）。

上述在經濟結構性調整和重組期會被淘汰或改造升級的，是夕陽產業或行業。即使朝陽產業或行業，如中國領先全球的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和鋰電池等行業，也會在經濟周期性起伏中表現出一時供應大於需求。耶倫為支撐其錯誤觀點，舉中國曾經在鋼鐵和鋁等行業上「去產能」為例，來掩護她對中國在21世紀先進產業或行業上的領先地位的無端指責，既是經濟學常識性錯誤，也是思辨的邏輯錯誤。

第三，耶倫混淆了一國市場與世界市場。

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和鋰電池等行業，無論在一國市場還是世界市場，相當長時期都是供應大於需求，在世界市場上尤其如此。耶倫指責中國的有關產品價格具競爭力而影響美國相關行業發展，這是典型的保護主義觀點，為西方經濟學一貫所不屑。

相比較耶倫就具體行業提出一個破壞西方經濟學原理的觀點，拜登政府的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更是在社會經濟制度上提出一個顛覆西方經濟學的結論。

2024年4月4日，戴琪在比利時魯汶出席「歐盟—美國貿易和技術理事會」會議前，在卡內基基金會歐洲分部出席一場活動時稱「在中國非常高效的經濟制度面前，我們的經濟體正艱難生存。」「我看到了來自中國的挑戰……在與（中國）非常高效的經濟體系的競爭中生存下來，這就是我們的企業面臨的挑戰。」

戴琪宣稱中國「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濟增長」是中美關係緊張的關鍵因素之一，美歐應採取適當「反制措施」，共同應對中國經濟模式對西方所謂「經濟開放體系」帶來的挑戰。戴琪在回答現場提問時稱，中國的經濟制度「從根本上」與美歐不同，「不是以市場為基礎的體系」，因而美歐的經濟體系「難以與之競爭並生存下來」。

美國已無力把握百年變局

西方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制度優於非市場經濟制度。美西方普遍性觀點是，中國近年經濟倒退。於是，就有戴琪所認同中國經濟制度「從根本上」與美歐不同、「不是以市場為基礎的體系」的判斷。然而，理論上被認為優越的西方經濟制度，實際不敵中國的經濟制度。戴琪承認這一事實，對中國經濟體制非常高效的肯定，打西方經濟學耳光，也等同否定美西方對中國經濟的攻擊和貶抑。

耶倫和戴琪的理論和思想混亂，折射拜登政府乃至美國精英已無力認識和把握百年變局。

資深評論員、博士